



一个人,他的要义不是维护和粉饰自己的伟大,而是心脏跳啊跳,是活着:我活过了我活着的每一刻,在我活着的每一刻里,我一直在思考和认识,感受生命!从这个意义上,我为书中琳·乌尔曼的提问和披露以及伯格曼的直言大大地点赞。

在长时间沉默后,他开了口:“问题是,我们的年龄相差太大。我们就没啥好谈的。”这里的“我们”,是一个“女孩”和比她年长48岁的“父亲”;这对父女要能展开一段谈到一块儿的对话还需耽搁很久,或许是到她的中年,而那时“父亲”已走上生命旅程的最后一段。

小说,还是自传?

琳·乌尔曼(Linn Ullmann),1966年出生,是定居于挪威首都奥斯陆的女作家,既喜欢弗吉尼亚·伍尔夫,也喜欢爱丽丝·门罗。她曾在纽约学习和生活,有机会涉足演艺圈和模特圈,但放弃了,她梦想做文学研究者,惜未能实现。取而代之,她当上了文化记者,继而深感新闻书写无法充分表达内心,在1998年成了一名小说家。《焦虑的他们》是她的第5部作品,2015年以挪威语出版,2016年秋瑞典语译本面世,获得2016年北欧理事会文学奖提名。

开宗明义,琳·乌尔曼说:“看见、回忆和理解。这一切都取决于你站在哪里。我第一次到哈马斯(英格玛·伯格曼在法罗岛上的主屋所在地)时不足1岁,对那场把我带到那里的巨大而颠覆性的爱一无所知。其实,那是三种爱。”她又感慨:“假如有一台望远镜能对准过去,我会说:看哪,那里,那里是我们,一切是这样走来的。每一次,要是我们对我记得的是否正确,或者你记得的是否正确,或者是否真发生过,或者,首先我们到底是否存在发生疑惑,我们就可以一起注视。”所谓三种爱,指父母间的爱;自己对父母无条件的爱;自己对父亲所在的哈马斯的爱。

本来,她的父亲、世界著名电影导演英格玛·伯格曼和她提过,帮助写一写老父的“结束语”——这话说了好几年,也有所过各种打算。终于,她在2007年5月和父亲对谈并录音,可他真是老了,病了,健忘、时常闹不懂她是谁,同年7月以89岁高龄离世。计划的书没写成,这本疗治悲伤的小说出现了——《焦虑的他们》梳理了与“我”及“父亲”相关的生活记忆,也包含他人的面影,如身为著名影星的母亲,同父异母的哥哥、姐姐,父亲的前妻们,而占篇幅最多、最直刺人心的内容还是“父亲和我”。

琳·乌尔曼用了几年时间筹划这部书,真正动笔不过几周,其间她经历了在“感受各种阻碍”和“期待获得自由”之间的挣扎:怎么描述名人父母——瑞典导演英格玛·伯格曼以及比伯格曼小了近21岁的挪威女演员丽芙·乌尔曼;怎么识别自己和他人的记忆;怎么超越名声和他人的好奇,接近真实,获得靠近和抵达真实的自由和开放。确实,记忆需要识别,曾同处一个时空的人在回忆同一件往事时会展示截然不同的细节。

如何称呼书中人物让作者苦恼了很久。她对命名有切身体验:

命名,给予,接受,拥有,带着个名字生存和死亡。我愿写一本没姓没名的书;或一本有许多姓名的书;或一本书,所有名字都那么平常,平常到人们会立刻忘记它们,或是它们大同小异、难以区分。我父母给了我(在好多被肯定又否决的名字后)一个名字,可我从不喜欢它。我在这名字里认不出自己来。当人们叫起我名字时,我感觉就像是没穿衣服,跑到了人堆里才发现自己是裸体的。

她坚信,命名会传递某个讯息。因为小说的自传性,本可使用真名实姓,然而有关父母的书籍和采访已有无数,她担心和这些叙述直接挂钩。除“英格玛”出现在祖母的日记中外,主要人物只被作者称为“父亲”、“母亲”、“女孩”,“女孩”也以成年的、现在的、第一人称的“我”或第三人称的“她”登场。这个“她”用在插播的几段父女对谈录音文字版里,“父亲”相应地化为第三人称的“他”;人称转换表达了从不同角度照射出不同影像的意图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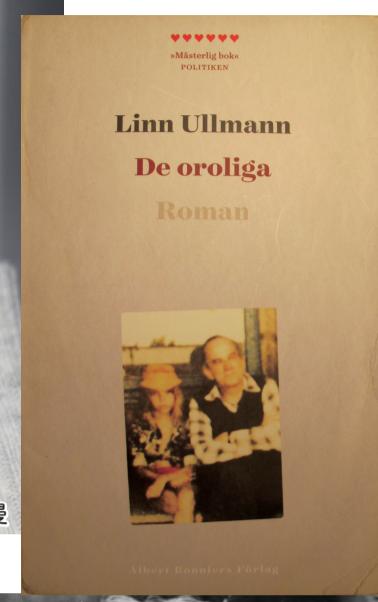
虽然在命名上采取了虚化,小说还是让人难以分辨:到底是带有文学手法的回忆录还是通常意义上的虚构小说呢?书中的人名、地名、时间、事件和史实吻合,甚至心理活动描写也接近真实——因为作者在接受媒体采访谈心路历程时,采用的竟然是小说文本里的字眼儿。那么,书中的细节全都真实发生过吗,究竟虚构的内容在哪里?作者不肯指认,她一面坚称作品是小说,一面强调它比回忆录或传记更真实。她率直地告白:小说家就是职业说谎人,不必让一切确凿,至于事件是否都像她写的那样发生过,听凭读者判断。

琳·乌尔曼坦言自己的创作都有自传成分,只不过这本更明显。经历了多次

记忆看见我们

——父女的对话和《焦虑的他们》

□ 王晔



《焦虑的他们》瑞典文版

正是儿时的他对电影放映机的看法。他似乎比女儿更像个孩子,更需要魔法。

女孩成年后,父亲建议她和自己对话时用挪威语,认为她的瑞典话怎么说都像个孩子。“父亲”的评论很像是琳·乌尔曼虽富足快活,客观上却破碎分离的童年映射,可以大胆猜测,是自小和父亲及父亲的祖国瑞典的分离,从根本上贡献出了她瑞典语的童言特征;与其说她的瑞典语是在语法修辞上接近儿童语言(从访谈中看,这种特点并不明显),不如说是她和父亲的完整关系在童年时的突然断裂和发展的阻滞,使她的瑞典语始而无法远离断裂时段,笼罩了一层童年时的光影,而这光影存在于“父亲”敏感的知觉里。

她在作品中采用了“父亲”最钟爱的巴赫无伴奏大提琴曲的六段结构——伯格曼最后一部电视电影就以巴赫这一组曲中的舞曲“萨拉班德”命名。她称第一章为“前奏”,最末为“吉格”。那些和“父亲”的对谈录音,几年后再听,却捕捉到有趣、特别的片段。以录音带的剪辑为经,回忆纬,穿梭编织,一段段故事开始、展开又收拢。有不同的声调和节奏;每一章也以略微不同的调子重复提及家庭史中的某些片段和冲突。最后一章主要讲告别,但她笔下的吉格舞不只流露悲哀,主观上,她追求的据说是新奥尔良式葬礼后载歌载舞的精神。

想做孩子的大人

不想当孩子的孩子

琳·乌尔曼的语言细致,她隔着数十年的岁月去捕捉人生瞬间的细微感触,再娓娓道出,这些感触有时是记忆中那年、那月、那一刻的,有时又像是今日的“我”立在过去的云头上,俯视一切而得。

“我生来就瘦弱”,这话有些意味深长。出生时,母亲的丈夫不是“女孩”的生父。在法罗岛,父母曾带着出生不久的她共同生活。短短数年,大人的关系破裂。女孩和行李一起被母亲拉着,远离了父亲。女孩重返法罗岛是在后来——几乎每个夏天,她会到父亲的家里待上几周。

女孩平时和母亲住在挪威,担心事多繁忙的母亲会随着来接她的小车永远消失;可也只能焦虑、紧张甚至歇斯底里地等母亲给自己打电话。而瑞典的父亲规矩多,脾气大,他会在日历上写好和她说话的时间,和孩子一起毫无耐心。让我们看看文章开头提到的那场失败的父女对话吧——她坐在一张椅子上,他在另一张。她感觉到父亲增长的绝望。“年龄差48岁,48岁是很长一段岁月——她没法套上七里格魔法靴大步赶上他。”女孩告诉父亲,想要一把世上最好的椅子。他问:

“是个譬喻吗?”

“啊?”

“有些东西不是它们看上去的样子,

这叫譬喻。我是说,这椅子是象征了你内心什么想法或梦吗?”

“不是,”女孩回答,“我觉得不是。”

“是魔法椅?”父亲问,

“不是,”女孩叹了口气,“就只是一把椅子。”

这段对话生动体现了父女间沟通的艰涩。“父亲”用成人的思考来接近孩子,才会有“譬喻”这样艰深的语言;可他也不纯粹是个大人,他是不肯迁就别人的孩童。在伯格曼的童年甚至一生里,都眷恋魔法,甚至他的回忆录就叫《魔灯》,那

的心事重重。焦虑来自繁多的生活项目,来自野心,也来自孤独——无论是女孩还是她那极负名望的父母都直言孤独,他们容易受伤也难以安宁,始终奋斗。孤独的原因之一,或许是,不知道“我究竟是谁”。

“父亲”自白:越年老却越发不了解自己。有个以细微的变化重复出现的梦想让他一再惊愕。在梦里,有时他在一条小路上绕着一座宅子走,最后走到房前,身边冒出个陌生人来。他对那人说:这房子真不错。陌生人答:你一定很骄傲吧。他才明白自己就是房主。有时,他在屋内来回踱步,深度怀疑自己和房子的关系,然而这房子及地址明显是大家公认的对他的认知。他一面意识到确实是自己给房子定了风格,添了家具;一面又觉得这实在是弥天大谎——因为自己完全不是房屋的建筑者。甚至,他走到首都斯德哥尔摩,那里的人也一眼指认他是来自那所房子的那个人。

按心理学的解释,房子观照的是人的内在。这或许深奥,但不难感觉,梦中的他和那位陌生人是同一个人,是他在对自己发问:“我”到底是谁?在哪里?“我”只是别人眼中的房子、房主,抑或其他物理的、纪念碑式的存在?“我”对房子谈不上反感,甚至有骄傲,透露出“我”部分地认同自己,但依然坐卧难安——房子锁不住一个逡巡不已的灵魂。他需要在自己的内部来回踱步,也需要跑到自己的外头,喊问:“我是谁,谁是我,我在哪里?”

琳·乌尔曼一再表示,在书里,对她说,最不重要的就是父母的名望,她在乎的是父女和母女的关系。可阅读后仍然会有疑问:假如她的父母不是电影名人,小说可读性会不会打折扣?这是无解的问,也是小说先天的优势和不足。难以否认,在阅读时,读者会自动补充与英格玛·伯格曼和丽芙·乌尔曼相关的耳熟能详的电影和轶事。而即便在小说里,也处处能感受到那些电影和轶事的绿荫。

当然,作家的诚意不难识别。这位父亲为衰老和走向死亡苦斗过,起初他对这一过程发生好奇、积极应对,后来越发脆弱,更因失忆而让自己和家人伤感。父母的衰老会发生在每个人身上,于是该书也成了一本有关变老的故事,不仅年长的一辈要走过变老的过程,周围的亲人也得挺过这一变化。作家在乎的是分享这一超越私人故事的生活体验。

2006年秋,“他”只剩一年余命,那时的“我”不知,他也不知。他们一般在差10分3点在他的私人影院碰头。常年的导演生活使他成了重计划、极守时的人,这次他却迟到17分钟,茫茫然没有歉意和解释。这位和五任妻子及一个同居女友生过九个孩子的男人,年轻时就不清楚孩子们到底多大,生日是哪天,只囫囵知道他们大约生在他拍摄的某两部电影之间,到老了,在他还明白丽芙·乌尔曼是最小的女儿时,有一天,他问:“你到底多大?”她说:“四十。”他答:“四十?我的天!你有这么老了?!”

“不用语词的讲故事的艺术哪里去了?”某个下午,“父亲”放无声电影时喃喃。当他衰老了,他说有些东西随之消失了:“什么消失了?”“字眼。记忆。”读者不难将上述两段话剪贴在一起考量联想:没有了语词,缺乏了记忆,人还能讲述自己的故事吗?因为父亲的衰老、健忘和离去,“我”开始拼命抓住记忆——一个注

平常的无心的“点水”接成连续的有主题有内容的舞蹈。

“我有好多名字。爸爸叫我‘小中国人’,因为我有礼貌,笑得甜。除了从报上读到的,我怀疑爸爸会对中国有多少了解。他从不吃中餐,他的胃会因任何带有水果、蔬菜、大蒜等以及不是英格瑞德调理的菜而疼痛。1977年,我11岁。父亲知道中国,因为他读中国诗,明白‘好雨知时节’。”“我”猜测,父亲给她这一外号,因为他认为女儿和中国女孩一样爱笑、有礼,常常控制情绪的表露。母亲不知道这外号,她觉得女儿并不听话,甚至会歇斯底里。可见,和父亲相处时的“我”及和母亲相处时的几乎相反,“我”的两面从没有和父母同在的机会来合成——这是“断裂”的一种表现。

我把这部正被宣传为“杰作”的小说看作一部优秀的当代文学作品。小说陈述性的文字多过描绘性的,文字柔美而感性,可惜有些段落略显拖沓,也缺少更大的力度,像一幅未经裁剪的精彩的原始照片,尚不能称作艺术精品。书中某些内容被复述,缺少情绪和思想上的递进;零星而纷乱的内容,被作家按录音带一般忽而快进,忽而快退,条理不那么鲜明,起承转合也不够圆润,暴露出作家在把握素材零碎又有较大时空跨度的题材时掌控力不足。该书是还需打磨的好玉石,而小说所呈现的“回游”姿态是最美好的。

小说也令人不可多得的领略晚年伯格曼对人生的最新感悟。这位电影大师的作品给多数影迷的印象是:他探索存在,表达生存的斗争和对宗教的怀疑,也研究男人和女人、艺术与艺术家,在他生命的最后,他又如何看待那些探究过的主题呢?这对于了解他、理解他的电影以及更全面地理解一个灵魂一定至关重要。

“父亲”说衰老是劳作,起床、漱洗是,到外头呼吸新鲜空气也是。每天早晨,他列出问题清单:肚子疼、牙疼等;若超出8个,就想赖在床上,不过这种情况很少发生。他80多岁了,允许每10年对应一个问题。老人之后,除了字词和记忆,还有别的消失了的,让人想念或不想念的吗?他回答:

——不知道。有些日常的、从前觉得很重要的事,现在不重要了。

——有一次,你说变老是劳作,还记得吗?

——不记得……我觉得变老是个艰巨、沉重、有魅力的工作,伴随着很长的时间推移。不过,最重要的是,最重要的事!有些东西重要,有些不重要了。音乐,比方说,对我来讲就成了重要的事,之前我没把音乐当回事……

他的宗教观发生了巨变。晚年的他全然相信上帝,认为上帝就像音乐:

——不过,以前你不是疑虑过吗?

——没对巴赫。

——没有,但你怀疑过上帝。

——所有那些胡说八道现在都结束了,它们都走了。我就好像已没什么办法去胡说那些关于存在、不信之类的事了。

为何如此逆转,他解释道:“这有个过程……英格瑞德死后,我关于上帝意愿的体验变得密集了。我能站在外头,在这里,被海和云围绕,体验存在。”可他依然摇摆,一面坚信一旦死去就能遇到他最后的一个妻子英格瑞德(他不确定会遇见其他前妻们),一面觉得,“死就是死了,就是蜡烛的光灭了。”

音乐对这颗衰老而脆弱的心变得如此重要,他声称听音乐能得到和“活着”的联系。“你是知道的,我不是个爱哭的男孩……可我独自坐在那里听我那些唱片时,眼泪就淌下来了;得到被加强了的生命意识。”他坦言生活的某些部分叫人难忍,而当一个人老了,却能释放、限制或溶解那些难以忍受的,让人在某种程度上从先前苦恼的一切中自由出来。当然,会失去很多。原以为会哀悼那些失去了的、从前看重的东西,然而并没有,比如食欲,看到漂亮和性感的女子偶尔也会遐想,很快会笑话自己,仅此而已。“可我曾对女人那么感兴趣,不是吹牛……”

他�认为自己事业的很大部分来自对女人极大的兴趣;女人影响了他的内心。伯格曼给琳·乌尔曼留下了常常描绘对死亡的思考,认为死亡无时不在的印象。他略感意外:“也许是的,某种程度上,不过没那么明显吧……死亡作为童话故事,作为想象,是的,可我从没把它当真。现在得当真了。”什么叫当真?他说,就是具体,具体让他害怕——“因为这是真的了……很显然,某件事,你得经历,不慌乱。事实是,我没把任何事当真……我也会完全相反。”关于为剧场和电影屏幕的“小世界”忙碌一生是否感觉古怪,他不以为然:“没什么古怪啊。就像一颗心脏在跳啊跳,一切都在运动之中。假如不运动,也就不用理会它了。”

人不容易被简单地盖棺定论,也不需要做一个可被简单地盖棺定论的人。一个人,他的要义不是维护和粉饰自己的伟大,而是心脏跳啊跳,是活着;我活过了我活着的每一刻,在我活着的每一刻里,我一直在思考和认识,感受生命!从这个意义上,我为书中琳·乌尔曼的提问和披露以及英格瑞德的直言大大地点赞。